

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體認

國父的偉大

吳俊升

今年是中華民國六十年。六十年前的元旦，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中華民國成立。而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沒有國父的革命，就不會有中華民國。值此開國六十年的紀念日，我們自當首先要體認國父孫先生的偉大。

國父孫先生逝世，已經四十六年了。在他逝世以前和逝世不久，我們還不能充分體認他的偉大。可是時勢推移，經過四十六年的時間，全世界的局面不知產生了幾多變化。惟有在時勢不斷的變化中來衡量中山先生，衡量他對於中國乃至全人類的貢獻以及衡量他的學術思想，才格外見到他的偉大。

他的偉大，首先由於他是歷史上推翻數千年專制，創立共和的一個空前未有的革命家。在他以前，其他民族國家，也有不少有開國的偉人。但是赤手空拳推翻了數千年的專制，創立四萬萬人的共和國，像他這樣的開天闢地旋乾轉坤的完成革命的，在中外歷史上沒有第二人。在中外歷史上儘多霸傑，爭城奪地，建立帝國，聲威不可一世，但是他們只是以暴易暴，缺少救國救民救人類的理想。在中外歷史上也有不少團結民族建立國家的革命英雄和開國志士，但是他們的革命和開國的規模很少像中山先生的及身事業這樣偉大的。

就近世一時叱咤風雲的人物而論，當其盛時，有併吞六合之心。但是頃刻之間，身敗名裂，固然不能和革命建國成功的中山先生相比。就是那些新興的民族革命家，雖然不少奉中山先生為榜樣的，但是他們所周旋的局面很狹小，未足與中華大國相比，而且他們修養不夠，在行動方面不免流於淺薄輕率，或是投機取巧，難比中山先生的偉大風範。所以在幾十年來，世界浪潮，不知淘盡了許多英雄人物，惟有中山先生的偉大的革命風範，歷久常新。這一點乃是在今天紀念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格外應該體認到的。

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表現於他的偉大的革命建國事業。還表現於他的偉大的政治理想，為人類前途指示正確的方針。中山先生的革命，首先

在推翻異族統治。他的民族主義，為許多弱小民族指示了奮鬥的目標，也為亞非兩洲許多民族打開了獨立的途徑。他的革命示範的作用，在近代民族獨立歷史中，是要大書特書的。他的政治理想，也隨着亞非各洲民族國家的紛紛建立而發生燦爛的光輝。他的民權主義理想，使數千年專制的中華帝國成為民治民享民有的中華民國。這是破天荒的大變局。在二十世紀，許多國家多已建立了共和政體。但是我們試想在六十年前的世界，只有美國、法國、及瑞士，和中南美若干國家為共和建制，而中國當時又是數千年相承的君主專制國家。中山先生首創民國，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魄力。因為中華民國的建立，增加了政治家對於共和國體的信心和嚮往。共和新國，因而紛紛建立。所以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實是世界民主政治的一盞明燈。在開國六十年的今天，把他的政治理想放在世界政治制度的演進歷史中來衡量，格外見他的燦爛光輝。

中山先生的民生理想，開了近代社會主義實施的途徑。尤其表現他站在世界潮流的最前面，指示了補救資本主義的流弊的正確方針。在他八十年前開始鼓吹革命的時候，提倡民族主義，推翻異族統治，是繼承我國春秋大義的。在今日看來雖然覺得難能可貴，但是還可說是史有前例。至於改專制，建共和，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自然更屬難能。可是還可說已有美法先進國家示範。惟有揭揚民生主義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預防資本主義弊害，尤其是先知先覺，目光如炬，為世界人類指示了一條避免殘酷的階級鬥爭，而共向和平康樂的大道前進的明燈。

中山先生的這種社會理想，在開國六十年的今日回看一下，格外覺得有超時代的銳敏的眼光和積極的救人救世的計劃。我們試想蘇俄的共產主義革命，尚在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義以後數十年發生，又想起共產革命所引起的世界浩劫，以及人類滅絕的危險，便格外不得不佩服中山先生的高瞻遠矚救世救人的苦心，因而格外不得不佩服他的革命理想的偉大了。

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偉大，尚不全在於他提倡實施民族民權和民生理想，還在於他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者合而為一。三者彼此互

相限制，互相輔助，不致流於極端而成爲近代政治歷史中的由民族主義演成的帝國主義或極權主義，由民權主義演成的個人放任主義，由民生主義演成的共產主義。三民主義乃成爲一個偉大的主義。

我們今日縱眼看世界大勢，可以說正向三民主義發展。舉幾個重要實例，如世界列強和聯合國積極扶助弱小民族的獨立，如蘇聯的經濟體制有容許個人牟利的趨勢，如土地改革計劃在各落後國家的推行，如美國的資本主義，漸漸注意全民生計，產生了詹森總統的大社會計劃，都是向三民主義發展的。至於三民主義在臺灣的具體實施，更不待論。中山先生革命與建國思想的偉大，實在從世界政治趨勢中具體表現出來。

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表現於他的革命事業和救世理想，還表現於他的方法論。他的革命不僅有理想，有計劃，還有方法。他的革命方法論，便是他的知難行易學說。他反對「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舊說而主張知難行易。他作此主張，原先側重在「行易」，鼓勵同志冒險犯難去革命。後來注意到「知難」，鼓勵革命黨人不僅勇於行動，還要將行動建築在深厚的知識基礎之上。不過他的求知方法，不是離開行動而求知，乃是行以求知。不知固然能行，但是不行則不能知。他注重在行而後知，這是中山先生對於知行合一的新功夫。這種方法論和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正相吻合。一切自然科學的知識，乃是由實驗的行動而產生而證實的。沒有實驗，便不能發生自然科學。正是如中山先生所說「行而後知」，「不行便不能知」。

中山先生的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方法相合，此處也見得他的偉大。中山的方法論不但合於科學方法，還合於由科學方法啓示所產生的哲學上的實驗主義。原來中山先生在創立知難行易學說的時候，曾經和當時在中國的美國實驗哲學家杜威博士討論過。在孫文學說裡，中山先生曾經這樣說：「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之爲難耳，未聞行之爲難也』」。杜威在他自己的著作和演講裡，也曾有多次讚許和解釋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在他的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裡，杜威說：「昨天我和前總統孫逸仙博士共進晚餐，發現了他是一位哲學家。他寫了一本書，將要出版。書裡說，中國人的弱點由於相信古說：『知之匪艱，行之維艱

。』因此他們不喜歡行動，却認爲得着事理的完全了解是可能的。而日本人的長處，却在於他們甚至不知而行，勇往直前，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中國人怕行動發生錯誤，因而袖手不動。所以他爲他的國民寫了一本小書，告訴他們『知難行易』。」不久杜威在一九二〇年 *Asia* 雜誌，又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 *What holds China Back*。也有類似的關於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的敘述。杜威在北京講倫理學時，又提及中山的學說，他說：「實行就是求知知識。知識要經過實驗的陶鍊，才能正確。中國大政治家孫逸仙先生說，『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兩句話，貽禍中國不淺，就是使人怕事偷懶，養成泄沓昏沉之風。這話實在很對。我們雖然不能逆料成敗，却不能不冒險去行。多行一次，就多一番經驗。多一番經驗，就增一度智識。所以知識和信仰——一種情緒——有密切的關係。要是有信仰，一知便行，行了智識自然增進。要是先求知知識的完全，然後去行，恐怕終生也無機會去行呢。英國有句俗話說，陸上學泅水。那些求知不實行的人，就好像學泅不入水。」這番話是知難行易學說頗好的註釋。杜威在北京講教育哲學時，又支持知難行易的學說。他說「我聞中國古代有『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話。試驗的方法，却與之相反。這是只有行然後可以知。沒有動作，便沒有真的知識。有了動作，然後可以發現新的條理的知識，以及從前未發揮的知識。故曰：『沒有行，決不能有真的知』。」

杜威的這番話，簡直是以實驗主義爲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作注腳了。我引了杜威的這許多話，只是說明國父的知難行易學說，不單是合於科學方法，並且是具有哲學的基礎的。他的革命的方法論的偉大，也由此可見了。

從以上的話，可以答覆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在什麼地方的問題？我的答覆是：中山先生的偉大，在於他的空前的革命事業，在於他的站在時代前面的革命的理想和計劃，在於他的合於科學方法與哲學精神的革命方法論。

國父自己曾經說過，由於他早年在香港求學，他的革命思想開始孕育於香港。香港的環境，幫助產生了這位世界偉人，這是我們現在旅居香港的人，可以驕傲的。